



哲学研究论丛
ZHEXUE YANJIU LUNCONG

《管子》 管理哲学思想研究

万英敏 龙婷婷◎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本书由人文在线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管子》 管理哲学思想研究

万英敏 龙婷婷◎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管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 / 万英敏, 龙婷婷著.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196-0090-7

I. ①管… II. ①万… ②龙… III. ①法家②《管子》

—研究 IV. ①B226.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1690 号

《管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

作 者	万英敏 龙婷婷
责任编辑	温 海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63567691 (编辑部) 010-63588446 63567692 (发行部)
网 址	www. edpbook. com. cn
E — mail	edpbook@126.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6-0090-7
定 价	36.00 元





前言

《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广泛流传，并受到社会上的普遍关注。作为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汇编，《管子》一书内容表现出包罗万象、宏博精深的特点。《管子》书中有着丰富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中起到积极作用，就是在今天仍是重要的思想资源。《管子》一书还有着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本书主要采用归纳、分析的方法对《管子》进行研究，从有关《管子》的历史文献资料出发，通过对有关《管子》的文献资料的梳理、归纳，发掘出《管子》的管理哲学思想。全书共有八章，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即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管子》一书的基本情况，包括作者和时代、版本的流传、目前的研究状况等；综合历代研究《管子》者的观点，对《管子》一书作者、断代及《管子》一书的性质作出结论。

第二章至第五章为第二部分，分别是《管子》管理哲学的思想基础研究。其中第二章是《管子》管理哲学的自然观基础——“人与天调”；第三章是《管子》管理哲学的伦理学基础——“义利并重”；第四章是《管子》管理哲学的方法论基础研究，其中包括两个部分，即方法论基础之对立统一——“予之为取”的为政思想以及方法论基础之变化发展——“执经达变”的变化思想；第五章为《管子》管理哲学的经济学基础——“通货积财”思想研究。

第六章至第七章为第三部分。第六章是《管子》管理哲学的核心精神——“以人为本”思想研究，分析西周以来天命观思想的变化，阐述《管子》书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及以人为本思想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应用；



第七章是《管子》管理哲学的主要特点——“礼法并重”思想研究，分析礼与法产生的根源，阐述《管子》关于礼与法的思想及《管子》“礼法并重”思想的应用。

第八章为第四部分，主要是探讨《管子》管理哲学的历史影响、时代局限及现代价值。

结语部分阐述从传统哲学中找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吸取古代哲学智慧，提高与丰富现代人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发掘其合理因素，使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管子》概述	8
第一节 《管子》作者和时代	8
第二节 《管子》版本及流传	10
第三节 目前研究状况	11
第二章 《管子》管理哲学的自然观基础——“人与天调”	14
第一节 人与天调的哲学渊源	14
第二节 《管子》“人与天调”思想	20
第三节 “人与天调”思想的应用	24
第三章 《管子》管理哲学的伦理学基础——“义利并重”	30
第一节 《管子》义利思想产生的背景	30
第二节 《管子》义利并重思想	36
第三节 义利思想的应用	41
第四章 《管子》管理哲学的方法论基础	44
第一节 方法论基础之对立统一——“予之为取”的为政思想	44
第二节 方法论基础之变化发展——“执经达变”的变化思想	50



第五章 《管子》管理哲学的经济学基础——“通货积财”	66
第一节 《管子》之前经济思想	66
第二节 《管子》经济思想论述及应用	68
第六章 《管子》管理哲学的核心精神——“以人为本”	80
第一节 西周以来天命观思想的变化	80
第二节 《管子》书中的“以人为本”思想	87
第三节 “以人为本”思想的应用	90
第四节 《管子》人才观	95
第七章 《管子》管理哲学的主要特点——“礼法并重”	104
第一节 关于礼与法的起源	104
第二节 《管子》关于法与礼的论述	115
第三节 《管子》“礼法并重”思想的应用	122
第四节 《管子》礼法并重思想之音乐教育思想	129
第八章 《管子》管理哲学思想的历史影响及现代价值	133
第一节 《管子》管理哲学思想的历史影响与时代局限	133
第二节 《管子》管理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150
结 语	157
附 录	158
参考文献	171
后 记	178



绪 论

《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正如 20 世纪初著名学者罗根泽在《管子探源叙目》中所说：“《管子》在先秦诸子，哀为巨帙，远非他书可及……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管子》一书有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本论文从管理哲学角度出发总结、归纳《管子》书中的管理哲学思想，并分析《管子》管理哲学思想的哲学根源、应用及现代价值。

一、管理、管理思想及管理哲学

1. 管理、管理思想及管理哲学的概念

管理是自人类有组织以来就存在的活动。在一切人类活动系统中，只要牵涉到人群与组织，管理就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最原始的组织，也必须有资源配置和使用上的协调。按照经典的定义，例如法约尔的定义，管理是一种活动，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我们认为，管理是指通过对资源的配置、调控、使用，而使系统具有高度动态稳定性和发展潜力的目标性的协调活动和过程，在这过程中同时涉及制度与组织结构的建立与调整，信息的传递、处理、储存和目标、计划等的制订与实施，等等。因此，管理是一种具有高度共通性的活动。在通常的理解中，管理具有领域间的共通性，即管理是跨领域的活动，不管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科学技术研究中，都存在着管理活动。

管理思想是人类在其管理活动中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而总结出来的有关有效管理的各种观念、主张和知识。中国古代许多的思想论著中都有思想家们对管理的看法，如《尚书·典范》把“食”与“货”列为八政之首，从而把这二者作为管理的目标，并包含对它们矛盾关系的阐述；《周礼》中出现了完备的国家管理思想与市场管理思想，对行政管理制度与责



任制亦作了具体记述；《考工记》是中国最早的科技文献，反映了古代工艺管理水平。

任何哲学的产生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实践需要的基础上，管理哲学也是如此。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或社会斗争等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管理活动。无论是什么形式和哪种内容的管理活动，管理者以及参与管理的人，都需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认识和运用管理的一般规律和一般原则，才能搞好管理，这就需要对管理进行哲学概括。管理哲学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是由泰罗提出来的。泰罗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奠基人，被西方管理学界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他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说：“科学管理的理论或者说科学管理哲学，虽则刚刚为人们所理解，而管理实践本身却已逐步推进。”他认为，“科学管理包括着某种主要的普遍原则，是一种能以各种方法运用的哲学观。”他还指出：“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包含着某种哲学。”从泰罗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管理哲学”是科学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管理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必须遵循的一些主要原则或原理，而且这些原则或原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说明泰罗在建立科学管理理论时，就已认识到管理哲学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了。

到了1923年，英国管理学家谢尔登出版了一本叫《管理哲学》的书，在这本书中，他宣称：“本书不是从事于阐述某一特殊的管理，而是试图阐明统治整个管理实践的目的、发展路线和原则。”“我们应该创立一种管理哲学，一套原则，一套科学地确定出来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由于它们是实现最终的基础，所以应用它们来指导日常的职业实践。”谢尔登的“管理哲学”强调服务的经济基础、对人员效率和技术效率的重视，以及管理部门保证实施社会正义的责任等，以建立一种对各方都有利的工业管理科学。从中可以看出，谢尔登把管理哲学看成是指导整个管理实践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进一步明确了“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

美国哈佛管理丛书《企业管理百科全书》认为，所谓“管理哲学”是指事业最高主管为人处世之基本信仰、观念及价值偏好等。也就是说，管理哲学的主要内容是管理活动中人的地位及人的价值观念，这就把“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化了。



我们认为,管理哲学就是对管理的哲学理解和处理,就是研究管理领域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学问。这些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是从一般管理实践活动、管理科学中抽取出来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以及管理与自然与社会的本质关系等。

管理哲学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属于哲学范畴,具有较高层次的概括性,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它是从管理活动和管理科学中概括出最一般的本质和规律,对于管理领域来说,具有普遍性意义。

在管理哲学方面,自古以来,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在其著作中,都包含着一定的管理哲学思想,许多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工作的管理者在对其实际管理经验的总结中,也阐述了自己管理哲学的观点。中国管理哲学是以中国传统主流哲学为内核、融会古今中外管理学说中合理的哲学成分的一种具有历史连续性、内在一致性、普遍适用性和强大辐射力的管理哲学,它能够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为国家治理、企业经营、家庭生活和个人修养等各个层次上的管理活动提供指导和方法。它是依据中国哲学理念发展出来的管理哲学,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与现代管理知识及技术结合起来的哲学。

2. 中国古代诸子管理哲学思想

诸子百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管理哲学思想,阐述了自己的管理世界观和方法。这些思想在我国古代管理中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论及管理哲学思想的很多。例如儒家的人本主义。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以民本思想的形式出现的,其基本视觉是君与民、民与国家或者说天下大业之间的关系。所谓人本主义,就是将人视作天下的根本,视作人间一切事业的根基。它是儒家的基本管理思想。《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被管理对象的人民,比身为管理者、领导者的君更为贵重得多。“仁”是儒家人本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孔子把“仁”贯穿于整个管理思想中,“仁”规定着人们管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及其管理的最终目的和价值标准。孔子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富贵如果“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义



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种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管理思想的总基调。

道家强调“无为而治”的哲学观念。“道”是道家的中心思想。老子认为，道即自然法则，人们应当效法道或者说应当按自然规律办事。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他还指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德经·第三十七章》）如果能遵循道的法则，万事万物会自然发展得很好。老子认为，道的主流是无为，人效法道，就应当处无为而治万事。无为并非毫无作为，无为是顺应自然规律的自觉行为，无为是国家一切管理活动的最高准则。这一思想亦经常被统治者用于管理国家事务中。老子还认为，一切现象都是相互对立的，而且这种对立的关系也是可以转化的，即“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抑扬相合、前后相随。”（《道德经·第二章》）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提出尚同、尚贤两大管理哲学思想。尚同是要求各级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要按一个共同的标准行事。尚贤即要求各级领导者重视人才，崇尚贤者，把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贤人推举到各级管理岗位上来。为做到尚贤，提出“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的三不原则，对使用人才提出“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尚贤》）的三本原则。

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的管理哲学思想。同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相反，法家主张直接以事功和功利为本。韩非认为，作为君主，就应当以富国强兵为追求目标，即“为治者，不务德而务治”。（《韩非子·定法》）“明主之治国也，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肠。此帝王之政也”，（《韩非子·六反》）以力、事、功、过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韩非认为，严行法治，可以使富国强兵和霸王之业这一最大的功利顺利实现。“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韩非子·六反》）

兵家强调谋略的重要性，事先必须周密分析各种条件，必须知“道”（被领导和领导的意愿相一致），而且对天（天时）、地（地利）、将（领导



才能)、法(组织、编制、责权区分)这“五事”给予充分考虑;同时还要把和竞争对手的“七计”进行认真比较。“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兵法·计篇》)

3. 《管子》管理哲学思想

《管子》一书有明确的思想体系,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书中有许多反映管理哲学思想的论述,但在以前的研究著作中很少有人论及。在关于《管子》的管理哲学研究方面,关于哲学方面的文章有一些,如《〈管子〉的哲学思想》《论〈管子〉四篇的“道——气”一元论》《〈管子〉的辩证思想和方法》《管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试论〈管子〉的哲学和治国安民的务实精神》等。《〈管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认为,《管子》的哲学思想主要为道家的思想,它不但发扬了老子的学说,而且还杂以别家的见解,把中国周、秦以来的哲学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论〈管子〉四篇的“道——气”一元论》认为《管子》四篇在吸收了老子关于道的理论的合理成分,改造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六气之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道——气”一元论。它的基本思想——从道、气的统一,道、德的统一,到形、神的统一——都贯彻了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原则。《〈管子〉的辩证思想和方法》认为,《管子》的辩证法主要是关于社会管理的辩证法,它既论述了政治上的君与民、君与臣、礼与法的关系,又说明了道德上的义与利的关系,还论述了经济上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它是积极的辩证法,并对后代思想家的辩证思维产生较大的影响。专著有陈鼓应的《管子四篇诠释》一书。而关于管理哲学方面,仅有《论〈管子〉的管理哲学》一文。该文从足衣食为礼义之先、扶农桑为治国之本,强化专业分工、治理经济环境两方面论述《管子》的管理哲学思想。

《管子》一书中包含的管理哲学思想在中国管理哲学史上有着重要价值。《管子》批判地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学说,对荀子、韩非子的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管子》的管理哲学思想,如强调满足人的自然本性的需要,提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重视教育,依靠意识



形态,张扬四维,教化百姓。这些思想在中国管理哲学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着重要价值。《管子》的管理哲学思想,既不是一般的管理思想,也不是一般的哲学思想,它是《管子》通过总结治国经验,所信守的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管理准则以及在此指导下所提出的管理措施和管理思想,体现了古代朴素唯物论的哲学观点,表现出深刻的哲理性和务实精神,是《管子》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管子》一书有着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辩证地吸收这些宝贵遗产,古为今用,对于构建现代管理哲学,丰富现代管理科学理论,搞好组织文化建设,指导各项管理实践活动,都有其重要作用。

作为集中反映管仲的管理哲学思想著作的《管子》一书,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管子》一般管理思想的多,研究管理哲学的少,并且缺少从哲学的高度来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远不能概括《管子》的管理哲学思想,可以说是《管子》研究领域的空白。在关于管理思想方面的论著中,研究儒、道、法家管理思想的著作很多,而专门研究《管子》管理思想的著作很少,一般集中在研究《管子》经济思想、法治思想等方面。研究《管子》管理思想的有《管仲的管理思想浅谈》一文,主要从坚持人本原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等两方面论述管子的管理思想。《〈管子〉的管理方法思想初探》指出《管子》的管理方法有以政令为主的行政方法、称为“心术”的思想教育方法、“法”为总纲的法律方法、简明的计算方法及其他管理方法。

本书站在哲学的高度,从管理哲学角度出发,总结、归纳《管子》书中的管理哲学思想,并分析《管子》管理哲学思想的哲学根源。本书主要采用归纳、分析的方法对《管子》进行研究,从有关《管子》的历史文献资料出发,通过对有关《管子》的文献资料的梳理、归纳,发掘出《管子》的管理哲学思想。采用对比方法,比较诸子在管理思想方面异同,从特点、历史影响及现代价值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二、本书的结构安排

本书以《管子》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关于《管子》的文献资料的梳理、归纳,阐述《管子》的管理哲学思想,并发掘其现代价值及贡献。



本书共分八章：

第一章，介绍《管子》一书的基本情况，包括作者和时代、版本的流传、目前的研究状况等。

第二章，《管子》管理哲学的自然观基础——“人与天调”思想研究，分析“天人相调”的哲学渊源，阐述《管子》自然观思想及运用。

第三章，《管子》管理哲学的伦理学基础——“义利并重”思想研究，分析义利思想产生的背景，阐述《管子》义利并重思想及运用。

第四章，《管子》管理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其中包括两个部分，即方法论基础之对立统一——“予之为取”的为政思想以及方法论基础之变化发展——“执经达变”的变化思想。

第五章，《管子》管理哲学的经济学基础——“通货积财”思想研究，分析《管子》经济思想产生的基础，阐述其经济思想及运用。

第六章，《管子》管理哲学的核心精神——“以人为本”思想研究，分析西周以来天命观思想的变化，阐述《管子》书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及以人为本思想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应用。

第七章，《管子》管理哲学的主要特点——“礼法并重”思想研究，分析礼与法产生的根源，阐述《管子》关于礼与法的思想及《管子》“礼法并重”思想的应用。

第八章，探讨《管子》管理哲学的历史影响、时代局限及现代价值。

最后是结语，论述要吸取古代哲学智慧，发掘其合理因素。

第一章 《管子》概述

第一节 《管子》作者和时代

《管子》是先秦时期重要的一部子书。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广泛流传，并受到社会上的普遍关注。《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可见，《管子》在战国已经广泛流传并达到了“家有之”的程度。《管子》对后世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西汉时代的贾谊、桑弘羊等人崇奉“管子之学”，贾谊认为管仲学派是重视用宗法道德来巩固封建统治，他说：“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筦（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筦（管）子愚人也则可，筦（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司马迁也熟读“管子书”，他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新书》）

但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官学，《管子》学说逐渐受到冷落。唐代以后，《管子》重新受到一定的重视，从唐到清末，产生了大量的研究和校勘《管子》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校勘与训释方面，缺乏宏观的整体研究。

《管子》经西汉刘向审定篇第、删除重复，最后定著为八十六篇。刘向并对《管子》进行分类编排，编为八组，分别为“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九篇、“短语”十八篇、“区言”五篇、“杂篇”十三篇、“管子解”五篇和“管子轻重”十九篇。

《管子》的作者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论。综合历代研究《管子》者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即管仲遗著说，部分遗著说，非管仲遗著说。1. 管仲遗著说。认为《管子》一书为管仲所著。《韩非子》《史记》《汉书》等均持此说。不过现在学者不这样认为。2. 部分遗著说。认为《管子》中既有管仲的著述，又杂有后人之作。如西晋之傅玄，宋代苏轼、叶适，明代梅士享，清代顾炎武等皆主此说。如《通鉴外纪》引傅玄言曰：“《管子》之书，过半便是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今人更有明确界定《管子》中管仲遗著之篇章者，如关锋认为《管子》书中的“经言”各篇以及“外言”的《五辅》篇，基本上是管仲的遗著。3. 非管仲遗著说，认为是管仲学派的著作。池万兴认为，《管子》一书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当是管仲后学阐发管仲遗说之作，是由其弟子和后学代代相传、从春秋到战国陆续完成的。这些弟子与后学代有其人，因此在齐国长期形成了一个以崇尚管仲功业、推崇其理论、阐述与发扬其思想的管仲学派。王德敏认为，“《管子》书不杂，它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它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管子》是管仲学派相继完成的集体成果。余敦康认为，尽管《管子》书中有不少稷下先生的著作，但“其中大部分的思想史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

关于《管子》断代方面，学者也有许多论述。刘蔚华、苗润田认为：《管子》“既有春秋时代的文字，管仲的遗说，又有战国及秦汉间的文章，不能认为它就是稷下学者的论文集或稷下学者所撰。即使是其中的战国时期的文章，也未必尽是稷下学者之文。”^①白奚在《稷下学研究》中指出：“《管子》是齐宣王、湣王时期稷下学宫中一批佚名的齐地土著学者依托管仲編集创作而成，目的是为了保持齐学的本土特色，高扬齐学精神，发展齐地固有之思想文化，从而同外来学者们争夺在稷下学宫中的主导地位。”池万兴认为：“它包含了春秋时代齐国的史官以及管仲的门人弟子、后代，直到战国田齐时代稷下学宫崇尚管仲功业的可以称之为‘管仲学派’的稷下学士的论著。也就是说，《管子》一书的断代应该是：春秋管仲时代到

① 刘蔚华、苗润田《〈管子〉与稷下学》，《管子学刊》1987年创刊号。



战国末年齐王建时稷下学宫衰亡前的作品汇集。”^① 胡家聪在他的大作《管子新探》中指出：“稷下学宫存在具有权威性的一个大学派——管子学派，他们推崇管仲又依托管仲而立言以弘扬管仲遗说，陆续撰写了大量的论著，而现有《管子》七十六篇仅仅是余存，佚失者当不少。《管子》书不论单篇、数篇传行或结集传行的，其性质均属管子学派的学派著作，应出自稷下学者之手（也不排除有的篇章作于行政官吏等人）。 ”^② 顾颉刚则认为：“管仲本是一个干实际政治工作的人，哪会有空闲功夫去著书，更哪会成为一位大著作家！而且管仲生于公元前7世纪的初叶，那时谁也想不到私人可以有著作流传这一回事……我很怀疑《管子》书竟是一部‘稷下丛书’，所以除了政治经济说各篇而外，有《弟子职》《小称》等儒家言，《七法》《法禁》等法家言，《幼官》《四时》《五行》等阴阳家言，《兵法》《制分》等兵家言，《地员》《水地》等农家和医家言，这就是因为稷下之学的方面本来即很广泛的缘故。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洗出这部书的真正时代和真正价值。”^③

本书认为《管子》应该是齐国稷下学者丛书。首先刘向编排《管子》时，以刘向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态度，再加上他所处的时代离战国时期不远，不可能把秦汉时期的书籍编入其中。再从文章整体性来看，虽然内容比较庞杂，但都有一个中心，这些文章都围绕这个中心来服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作者也持这观点。该书认为，《管子》体系的多元特征表现为它博采众家之说，从而使整个体系具有一种杂然纷呈的外观；然而它又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既表现在道家学说对整体所作的原则规定，又表现为法儒杂糅学说的政治思想构成了体系的主体并统驭全书。

第二节 《管子》版本及流传

《管子》的最早的定本是刘向校订的八十六篇本。后来合篇称卷，有

① 池万兴《管子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② 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③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第15页。